

《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

——《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及近代疑古思潮研究(上)

邱志诚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8)

摘要: 清今文经学的复兴及近代疑古思潮的蔚成大国是由历代学者《尚书》辨伪研究所催发的。由疑文献之伪进到疑史实之伪, 至康有为乃谓尧舜、三代历史不可信。近代胡适、顾颉刚援实验主义方法而承其绪, 更以全部古史皆伪。由于《尚书》辨伪的影响, 适会近代中国中西思想交汇, 中国传统史学自疑古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 而这一过程是以科学化实质的。

关键词: 尚书辨伪; 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 疑古思潮; 史学的现代转型; 史学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 K03;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2-0261-11

虽然学术界早就注意到了近代^①疑古思潮与清今文经学特别是康有为经学思想之间的联系^{②[1-3]}, 但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还是近些年的事。尽管如此, 却已取得不少成果^{④-5]}, 而以路新生先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用力最著而多洞见。同时, 随着近代社会转型、近代学术转型研究的勃兴, 又有学者将近代疑古思潮纳入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视野里进行考察^{⑥-8]}。与之相表里, 亦有学者从“科学化”的维度探讨了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的这一转变^{⑨-11]}。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 清今文经学的复兴及近代疑古思潮的蔚成大国乃是在历代学者《尚书》辨伪研究的浇灌下才有可能和得以开放的花朵。我们可以将我国疑古思想的发展概括为几个主要阶段: 潜流阶段(宋代以前)→尚书辨伪阶段(宋至清前期)→今文经学复兴阶段(清中后期)→疑古史观确立阶段(民国时期)。在近代, 由于中西思想的交汇, 疑古思想与“民主”“科学”^{⑩[11]}理念摩荡相扇, 激起了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全面反思。梁启超氏所倡导的“新史学”乃为其嚆矢。一言以蔽之, 更主要地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自身所孕育出的疑古史观而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的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在对自身的反思过程中开始了面向现代的转型。科学化则是这一转型的当然实质和内容。

一、《尚书》的今古文源流及伪《孔传尚书》经典地位的确立

《尚书》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 而且是我国存世最早的一部“书”。书者, “箸也。从聿, 者声。”^[12](65)]可见本义乃“书写/记载”这一动作之谓。“君举必书”^[13](卷十·庄公二十三年条, 77)], 就是从其本义上在使用。后来, “书”又引申指书写/记载的成果, 由动词变成了名词。“著于竹帛谓之书”^[12](叙, 314)], 即此用法。《尚书》既然是书写/记载的一个成果, 当然可以叫做《书》——不但《尚书》叫做《书》, 它如《易》、《诗》、《春秋》等也都叫《书》, 因为它们都是书写/记载的成果——反过来说, 《尚书》最初叫做《书》, 不过因为它是一本“书”而已, 等于没有书名。

“尚书”一词最早见于《墨子》: “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14](明鬼下, 62)], 或以为当句读作“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 故有人认为《书》改称《尚书》亦当在先秦。不过王念孙谓“‘尚’与‘上’同, ‘书’当为‘者’。言上者则《夏书》, 其次商、周之书也。此涉上下文‘书’字而误。”^[15](墨子第三·尚书条, 83)]今人刘起釪以为《墨子》之文即或不从王念孙说, “尚”字也应该视作时间副词,

不可与“书”字连读作书名《尚书》^{[16](7)}。所以,《史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17](卷一·五帝本纪,46)}中“尚书”一词恐当为“尚书”连文而用作书名之最早例。此后,《书》成为《尚书》的专称——这应该是省称《尚书》形成的结果。

《书》改称《尚书》之前,殆及春秋末造,《诗》、《书》、《礼》、《乐》虽已总名“经”,但未将“经”字分合其后。汉武立五经博士,诸书名仍未加“经”字,如《尚书》还是叫《尚书》或《书》而不称《书经》,《汉书·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18](卷三十·艺文志,1705)}可证。隋、唐沿习不改,至于炎宋,“宋儒删去(“尚”字——邱按),称《书经》。”^{[19](卷一·说录一·易经诗经等名条,9)}数名俱传至今,而以《尚书》为常。

按传统的讲法,《诗》、《书》为孔子所删定,清今文经学更以六经皆孔子作,这均非史实。《尚书》与《诗经》一样,非一人所作。《诗》大部采自各地人民群众;《书》为王室和诸侯的档案记录,自由众史官所作。“孔子对于《诗》、《书》只有传述,没有删正,更谈不到自作”^{[20](12)}。《尚书》在周时属“六艺”之一,是用来培养“君子”的教材。秦坑之后复用李斯语“史官非秦记皆烧之”^{[17](卷六·秦始皇本纪,255)},并禁《诗》、《书》,百家语,但禁止于民间,《诗》、《书》仍存于秘府为博士所职掌。及秦末群雄逐鹿,项羽霸王诸侯,火秦宫室——《尚书》一线之传几绝。汉兴,除秦禁,秦博士伏生求己壁藏之《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齐鲁之间”,“孝文时欲求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所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召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17](卷一百二十一·儒林传,3124-3125)}王国维氏曾说“太史公所谓古文,皆先秦写本旧书”^{[21](卷七·观堂集林·艺林七·史记所谓古文说,3)},后又说“六艺之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21](卷七·观堂集林·艺林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1)},将“古文”进一步限定为六国文字。伏生壁藏之《书》,非此古文则必秦小篆。汉初,我国文字正处隶变时期,伏生授《书》“于齐鲁之间”,自须将之转写成人所能识的当时通行的隶书(古隶),其绪欧阳《尚书》、大小夏侯《尚书》分别于武、宣时获立学官。然其虽为今文,当世并不而且在古文《尚书》出现之后也不称其为《今文尚书》,段玉裁说得清楚:“汉、魏人只有欧阳、夏侯《尚书》,古文《尚书》二目,绝无谓欧阳、夏侯为《今文尚书》者……晋以后古文盛行,始有言《今文尚书》以别之者……裴松之注《三国志》:‘《今文尚书》曰优贤扬厉’——此‘《今文尚书》’四字之始

见。”^{[22](卷一·尧典第一·平秩东作条,13)}

那么,《古文尚书》始见于何时?第一种《古文尚书》版本当为孔子家传本。首载于《史记·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益《尚书》滋多于是矣。”^{[17](卷一百二十一·儒林传,3125)}第二种版本为鲁共王本(亦称孔壁本),见载于《汉书》、《论衡》、《汉纪》诸书;第三种版本为河间献王本,见载于《汉书》;第四种版本为中古文本(中秘本),见载于《汉书·艺文志》,即所谓刘向以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者;第五种版本为杜林在西州所得漆书《古文尚书》,事见《后汉书·杜林传》;第六种版本为张霸百两篇本,当时即知其伪,事见《汉书》。上述诸古文尚书除张霸百两篇本而外,盖出一源。如《汉书》一则曰:“及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书》十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18](卷三十六·楚元王传,1969)},再则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18](卷三十·艺文志,1706)}据此,孔子家传本、鲁共王本、中秘本便系一源。又据《论衡》言“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23](卷二十八·正说篇,425)}亦可见鲁共王本与中秘本同出一辙。王国维也说:“安国虽读古文以今文,未必不别为好写藏之而后献诸朝”,“献王与鲁恭王(即共王——作者按)本系昆弟,献王之薨仅前于恭王二年,则恭王得书之时,献王尚存,不难求其副本。”^{[21](卷七·观堂集林·艺林七·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12)}是将鲁共王本、河间献王本、中秘本视同一出。要之,诸《古文尚书》(除张霸百两篇本)与伏生一系所传《尚书》均为古文(而译成今文),均为真《尚书》,虽在各自的传授过程中难免鲁鱼亥豕之讹,但“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文字异者”仅“七百有余”,“脱字”仅“数十”^{[18](卷三十·艺文志,1706)},可见歧异究小。

这里要说说《大誓》。伏《书》《大誓》目下仅两篇,与后得自民间一篇补足三篇。说见《尚书正义》引刘向《别录》、李注《文选》引刘歆《七略》,皆曰《大誓》孝武时得自民间而未确指自民间某氏,王充《论衡》则明指孝宣时得自河内女子,两参恐向、歆不误。要之,得自民间无疑。《古文尚书》同今文亦有《大誓》三篇(无论《古文尚书》为孔安国或孔安国家所献,皆在《大誓》得自民间后),这也是要注意的。迨永嘉之乱,载籍散佚,以未立于学官故(王莽时一度

获立，遽随新政权败亡而复被黜，“众家之《书》并灭”。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枚𨾏(《<舜典>正义》、《隋书·经籍志》均为‘梅𨾏’)奏上《孔传古文尚书》》^{〔24〕}(序录，16)——此《古文尚书》第七个版本——朝廷为置博士。梅书“犹阙《舜典》，自‘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传，多用王、范之注补之，而皆以‘慎徽’已下为《舜典》之初。至齐萧鸾建武四年，吴兴姚方兴于大航头得孔氏传古文《舜典》”，其文于“慎徽”以上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二十八字^{〔25〕}(《舜典正义》，13)，当时即被人揭穿其伪，因“方兴以罪致戮”而“事未施行”。^{〔25〕}(《舜典正义》，13)不过，“至隋开皇初，购求遗典”^{〔25〕}(《舜典正义》，13)，刘炫并之于梅《书》后，亦被立于学官。要之，梅𨾏所献《孔传古文尚书》(经并传)与姚方兴所献《孔传舜典》皆伪书(即非汉时《古文尚书》)——真《古文尚书》斗争了几百年均未被立于学官，而伪《古文尚书》一出就获立学官(其时与梅书同立学官的还有三国、西晋时就已流行的郑玄、王肃所注《尚书》，二氏皆古文家，所注为真《古文尚书》，然不过被目为与梅献《孔传》之不同注本被施以及乌之爱而已)，这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历史错位。

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初时并非就势同水火，这由武帝时古文《大誓》一出，今文学家立即就遵诏译读授徒可知。但到了西汉末造，古文学派日盛，今文学派官方主流地位日益受到挑战，因此，今文学家便一改先前态度，极力排斥古文。所以，今古文之争的实质是功名利禄之争，与统治阶级在其它方面斗争的实质毫无二致。王莽建新，托古改制为其政权寻求依据，故包括《古文尚书》在内的古文经获立——这是不能仅从王莽与刘歆私人关系上去申说的——王莽败亡，“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东汉王朝要清除新莽遗毒，故而《古文尚书》难逃复黜命运。

如果说《古文尚书》不被立于学官要从政治上去找原因，那么，伪《古文尚书》获立学官则不仅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了：如前所述，永嘉之乱，文化遭劫不下秦、项之火，梅书乘此时而出，自然人人宝爱，不复辨其真伪。与梅书同立学官郑、王注本经南北朝至隋相比梅书，则愈加颓势难振——《隋书》所谓“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26〕}(卷三十二·经籍一，915)是也。这里的“孔”即指梅书。唐孔颖达等奉太宗旨为《尚书》作正义，以为梅𨾏所献《孔传古文尚书》为真孔安国本《古文尚书》，乃采为底本，成书后于高宗时颁行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27〕}(卷四·高宗上，71)。梅献伪《孔传古文尚书》遂成为官定《古文尚书》标准版本取郑注真古

文本而代之，郑注真古文本遂寝。此真认婢作夫人矣。本习郑《尚书》的孔颖达为何要舍郑宗孔呢？这是我们应该追问的。考之史实，南北朝时北朝本治郑注《尚书》，后来也趋南学舍之而治伪《孔传》。至隋，如前引文言虽“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可见孔颖达等舍郑宗孔实承此迹，亦可见非孔颖达等一时之误致认婢作夫人——历代学者有是心久矣，婢之地位早已见崇隆矣。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给出的答案是：“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喜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文虽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28〕}(194)如北周陆德明作《经典释文》，所释《尚书》已用伪《孔传》。其实，辞藻章句之美(即孔颖达说的“其辞富而备”)只是表层原因，深层原因乃是孔颖达所谓的“其义弘而雅”^{〔25〕}(序，1)。伪《孔传尚书》承前代经学成就，牵合治道，大力弘扬为统治者所看重的儒家纲常德教，正如清焦循总结的那样：“《明堂位》以周公为天子，汉儒用以说《大诰》，遂启王莽之祸，郑氏不能辨正，且用以为《尚书》注，而以周公称王。自时厥后，历曹、马以及陈、隋、唐、宋无不沿莽之故事，而《传》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以诰”^{〔29〕}(序，1)，明君臣上下之义，屏僭越坑害之谈，“胜郑氏远甚。”^{〔29〕}(序，1)唐朝初立，加以太宗异代英主，是需要也知道对这一思想加以利用的。孔颖达等对太宗的心思恐怕是琢磨过的，所以他虽习郑，但终于弃郑。不过，我们亦无须深责之——就算他不取伪《孔传尚书》，恐太宗也会让其重修或让他人重修。比如，不谙太宗心事的高士廉奉旨所修的《氏族志》，就被责令重修。

二、宋元明对伪《孔传尚书》的疑伪

前已述及，梅献《孔传尚书》从东晋到唐无人疑其伪^④且被确立为官方版本，但是到了宋代，梅书就不再那么走运了，引起了学者的怀疑以致后来终被掀开罩在身上的神圣外衣露出作伪的本相。

第一个怀疑梅献《孔传尚书》的，是徽宗时人吴棫。其著作为《书裨传》，今已不传，然从陈振孙《书录解题》及它书^⑤可略窥堂奥。他是从语体风格着手的，认为伏生《尚书》佶屈聱牙，而《孔传尚书》多出的二十五篇(称晚书)却文从字顺，简单易懂，这是十分可疑的。朱熹十分欣赏他的怀疑精神，在其《语类》中赞扬道：“才老(吴棫字——邱按)于考究上极有功夫。”^{〔30〕}(卷七八·尚书一，1988)但觉得他怀疑得不够彻底，所以又说吴棫虽“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决，复为序文

所牵^{〔30〕}(卷七八·尚书一, 1988)。所以,理所当然,朱熹走得更远——“《语类》卷七十一至八十,卷一百二十五以及其文集内”,疑辨梅献《孔传古文尚书》的话“不下四十余处”^{〔20〕}(281)。他既疑《孔传古文尚书》经文本身(如他说“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不记得?此不可晓”,“孔《书》是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等等),又疑《书序》及孔安国《传》(如他说“《书序》本是无证据”、“《书序》不可信”、“《书序》恐不是孔安国作”、“《小序》断不是孔子做”、“《尚书》决非安国所注,盖文字困善,不类西汉人文章”、“《尚书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间人所作”、“今《大序》格致极轻,疑是晋、宋间文章”,等等)^{〔30〕}(卷七八·尚书一, 1178-1186)。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朱熹怀疑《孔传古文尚书》之伪亦如他批评吴棫一样也是不彻底的。他说:“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30〕}(卷七九·尚书二, 2052)也就是说,他虽疑其伪却仍然承认其经典地位,正如迷信的人虽明知木石偶像为假,却依然以其为神佛一样。这是因为伪《孔传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即所谓的“虞廷十六字”被吹捧为尧、舜、禹三圣相传授的“心法”,乃其理学/道学的始生之地。

受朱熹影响,学者疑《孔传古文尚书》伪者渐多,如蔡沈、洪迈、晁公武、赵汝谈、陈振孙、杨炎正、蔡傅、王应麟、王柏、金履祥等^⑥,而以朱熹弟子蔡沈《书集传》尤值一提。《书集传》乃蔡沈承师命所著,故多承袭乃师观点,不过,蔡沈在每篇篇题下标注“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无古文有”字样,暗示今文无的篇章晚出为伪,影响甚大。

我们知道,疑古思想非由宋遽起,溯其源可早及先秦。如《论语》有“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31〕}(子张, 213),《孟子》亦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32〕}(尽心下, 110)。渊源如此之早的疑古思想为何未能在东晋(伪《孔传》之出)至唐涌流成疑伪《孔传》之潮呢?为什么宋代又会形成疑伪《孔传》之潮(并远溯清今文经学复兴)呢?这里谈谈笔者的看法。

两汉经学在今古文的斗争中渐形成了严守家法师法与繁琐空疏的学风。就《尚书》言之,学究天人如司马迁者,在写《史记·周本纪》时,也因读不懂而无法称引《尚书》中关于周朝历史的几篇诰辞。所以,为防止杜撰,保证学有所出,汉王朝最初是提倡守家法师法的。《汉书》载“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

师法,遂不用喜”^{〔18〕}(卷八十八·儒林传·孟喜传, 3599)可证。学者也以严守家法、师法为荣,有违师法、家法者便被各家所非。皮锡瑞概括得很好:“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母敢出入。”^{〔28〕}(77)此风流弊,“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23〕}(卷二十八·正说篇, 425),“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33〕}(348)而已。同时,各家为了保持自己的功名利禄,强不知以为知,彼此争胜,终将经学引入繁琐一途——如秦恭“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18〕}(卷三十·艺文志, 1724)——“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终以自蔽。”^{〔18〕}(卷三十·艺文志, 1723)承此学风的唐前诸儒正如西方学者在经院哲学时期连篇累牍讨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之际那里还会想到根本就没有天使一样,他们也不会想到《孔传》会是伪书。此外,还有一个或许更重要的原因:伪《孔传》立在学官,尤其是孔颖达为之作《正义》后,是科举制下士子应试的唯一正版教科书,天下人岂敢有疑?直到宋前期士子应试时还必须遵行唐定注疏本,不许违背。如《文献通考》载:“(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亲试举人,得进士李迪等二百四十余人……先是迪与贾边皆有声场屋,及礼部奏名,而两人皆不与,考官取其文观之,迪赋落韵,边论‘当仁不让于师’,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参知政事王旦议:‘落韵者,失于不详审耳;舍注疏而立异,不可辄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当时朝论大率如此”^{〔34〕}(卷三十·选举考三, 286)——连注疏因为不能所以都不敢违背,又怎么会(自然更不敢)疑官定教科书为伪书呢?!那么,宋代为何会形成疑伪《孔传》之潮流呢?皮锡瑞解释说宋儒“不信注疏”^{〔28〕}(264)而好矜创获,我们当然应该比皮锡瑞看深一层,还要问问宋儒不信古人何以可能,即宋儒疑伪《孔传》的问题意识是如何产生的。

众所周知,宋代弱而不贫,经济繁荣,科技发达,诚如李约瑟所说:“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考查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35〕}(287)就学术而言,活字印刷术意义最著,书之易得,使习者可遍涉百家,学术视野趋阔且不必一定托身师门以至囿于师见而无开新。这为宋儒摆脱汉学流风形成有宋一代学术缔造了物质条件。

不过,条件毕竟只是条件而已,宋学的形成还有其自身学理脉络。前已述及,虽唐人刘知几、李汉之疑不是疑《孔传》之伪,然终究打破了汉晋间疑古思想之寂寂无绪而承传先秦。是故又有啖助、陆淳弃传径研《春秋》本身,所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

抱遗经究始终”^[36](寄卢全, 79)——薪传之功良不可没——宋儒难免受其熏染转能有所发明。如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率以己意释经,“其讲说多异先儒”^[37](卷四百三十二·儒林二, 12833),《宋史·儒林传》一针见血,谓孙复(石介受孙复之学)“大约本于陆淳”^[37](卷四百三十二·儒林二, 12832)。这样的三位汉学叛逆者竟皆入国子监为直讲,不要说在汉唐不可能,恐在其前黜落贾边的真宗朝也不可能。此可想见其时宋学风的转移和国家、社会对这种新学风的容纳。而三先生入国子监,“学者从之甚众”,“太学至不能容”,“太学由此益盛”,连皇帝也“车驾幸太学,赐(孙复——邱按)緋衣银鱼,召为迓英阁祗候说《书》”^[37](卷四百三十二·儒林二, 12833)。这当然更进一步推动了新学风的形成:“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38](卷八·经说, 774),终于继起有大家王安石“新学”,其与子雱等所著《三经新义》颁行天下^⑦。王氏撰《三经新义》自为图变汉唐旧俗之拘执墨守,为其改革张目并培养具有革新精神的人才,即其所谓“欲学究为秀才”^[39](卷一, 5),但举子汲汲功名,“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39](卷一, 5),这就使得《三经新义》仅仅成为取代唐代旧注的又一部官定教科书而已。历史走到了王安石意愿的反面。不过,作为负载着时代思想特征的事件的“取代”却又产生了另外的作用:既然以前的官定本可以被现在的官定本取代,以前的官定本作为“官定”本的神圣的光圈就会褪去。同时,现在的官定本又焉知不会被以后的官定本所取代呢?所以《三经新义》在夺取到以前官定本神圣外衣的时候在士子们的心目中却随以前官定本一道失去了神圣的外衣。正如西谚云“政治不过是一派要求在早上7点钟做弥撒而另一派要求在9点钟”——我们窥到这一真相,政治就不再有神圣性。概言之,王安石“《三经义》行,(宋人——邱按)视汉儒之学如土梗”^[38](卷八·经说, 774),不再象“唐及国初……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38](卷八·经说, 774)从这个意义上讲,孙、石、胡三先生和王安石的启后之功可能还要超过吴棫、朱熹。原因很简单,无之,则不会产生宋人疑伪《孔传》的问题意识。

“学术思想的运动、发展和变化,有它自己的一个‘自在’的生命。也就是说,学术思想是沿着它固有的生命轨迹运动、发展与变化的。”^[40](自序, 9)所以,尽管元、明两代王朝迭换,然两代之学术皆未足自立,实乃宋学余波。因此,本文把元、明学者对伪《古文尚书》的疑辨也放在这里一并里叙述。

此期第一部疑伪著作是降元帝胄赵孟頫穷半生之力所撰的《书今古文集注》,第一次把今、古文分开编排,惜其早佚^⑧。受赵氏影响,吴澄撰《书纂言》四卷,

刊落古文,只释今文。此一做法不惟勇决态度堪称称道,而意义更为重大。可以这样说,宋代疑伪到吴澄才有一个真正的小结。除此而外,元代疑伪颇知名者还有王充耘,著有《读书管见》二卷。

明代梅鷟是《尚书》疑伪又一大家。他著有《读书谱》四卷和《尚书考异》五卷^⑨,其书把《尚书》疑伪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一是他不仅疑《孔传古文尚书》之伪,而且进一步想要探究伪书的来源。二是在疑伪方法上亦不再停留于仅从文辞浅奥上区别,而是注重适用历史、文献证据进行比较分析。如《孔传》注“积石山在金城西南”,而金城郡为汉昭帝始置,事在孔安国身后——此种方法,实为清阎若璩之先导——这些证据大大提高了疑伪的科学性。以此,蒋善国评梅氏“是上承朱熹,下启阎若璩的惟一重要人物”^[20](282),良非虚誉。

梅氏前后,疑伪学者如罗敦仁、赫敬、郑瑗、杨守陈、归有光、焦竑、胡应麟、吴炯、郑晓等^⑩虽亦有卓见,然较之梅鷟,光芒自掩,故不再一一备述。

三、伪《孔传尚书》作伪的定案与清今文经学的兴起

清前期学术仍可视作宋学余波。一方面由于一些士人入清以明遗民自居,则不惟政治上持反清复明之立场,学术上亦当以绍述明学术为己任(当然会有反思批判,但反思批判正欲其发皇也),顾、黄、王三大家是典型的代表。另一方面,由于满清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同,朝廷选举取士仍“取四子书及《易》、《诗》、《春秋》、《礼记》命题”^[41](卷一百八·选举三, 3147),并采用程朱之注,宋人理学对士人思想的笼罩自为必然结果。所以,从学理上讲,清前期对《孔传尚书》的怀疑自为宋元明疑伪《孔传》运动之必然赓续,并且理所当然由明遗民开辟榛莽:黄宗羲撰《书经笔授》三卷^⑪。顾炎武虽无疑伪专著,但其《日知录》颇多议论。稍后姚际恒遍疑群经,有《古文尚书通论》十卷,已佚。又有《古今伪书考》,有关伪《孔传》的考论亦多灼见。

垂至阎若璩,踵前贤之迹而臻大成,三十年精力尽于一编,著《尚书古文疏证》八卷^[42]。该书一题一议,共128条。一条就是一篇论文,但其中有30条有目无文,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谓其“盖犹草创之本”^[43](290)。阎书辨《古文尚书》经文之伪是从以下三个方面为论的:一是从传授系统上指出梅献《古文尚书》来源不可信;二是伪《古文》的篇数与两汉人所说的不同,证明晚书即增加的25篇是伪的;三是《晚

书》与今古文经文均不同,这也可说明其伪。对于辨《孔传》传注之伪,阎氏主要也是从三个方面发明的:一是《孔传》是就经下为传,而汉武帝时传注无此体例——所以《孔传》自非孔安国作;二是袭用梅鹗“积石山在金城西南”例,以更多例证从地理沿革上说明《孔传》产生的年代后于孔安国,如此,《孔传》自不可能为孔安国作;三是以《孔传》与《孔安国论语注》乖违说明孔传非孔安国作。同时,还详考伪经传注之所本,如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四句出自《荀子·解蔽篇》所引《道经》、《左传·庄公八年》所引“《夏书》曰皋陶近种德”及其后鲁庄公接着说的“德乃降”一语,伪《大禹谟》连此三字采入作为禹讲的话,等等。真可谓宏文如炬,烛照处纤毫毕现。值得一提的还有,阎著卷八专门引述了自吴棫至姚际恒等人的疑辨之语,差为一部《〈古文尚书〉辨伪史》。

阎氏之后,继续疑辨《古文尚书》者还有王懋竑、李绂、杨椿、惠栋、程廷祚、李惇、戴震、王鸣盛、江声、宋鉴、崔述、崔迈、孙星衍、丁晏、皮锡瑞等,虽灼见纷呈,然要之不过是要将阎若璩修起来的这座大厦妆饰或改造得更完美而已,故不再备述。至若各代在疑《古文尚书》过程中产生的对《今文尚书》的怀疑,虽也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其理既一而源亦同,也不再涉及。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疑辨伪《孔传》何以在清前期定案并由阎若璩来宣告。

前已述及,清前期学术仍为宋学余波,如顾、黄、王即便痛诋宋明理学/心学的空疏误国,但“黄宗羲认为王学本身还是好的,顾炎武虽倾向于否定王学,却主张保存和改造程朱理学”^{[44](187)},王夫之对宋明理学/心学的态度虽较顾、黄激烈,但他在哲学上深深服膺宋儒张载,张载与理学却有颇深的渊源。阎若璩更是尊崇宋学的,他说“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可证。总之,宋学并未因鼎革中断,那么,源自宋学的疑辨《古文尚书》之伪学术运动自不会停止,终于在该结果的时候结出了硕果。这一硕果由阎若璩呈现出来,也不是完全偶然的。其父阎修龄为淮上望社主办人之一,望社的学风,趋于实证一路。谢国桢就据此谓望社“开出来阎若璩考古一派”^{[45](176)}。

从师承关系来看,阎对顾炎武、黄宗羲均待以师礼,致有人认为《尚书古文疏证》出于黄宗羲之授,虽钱穆已力辟其非^{[46](243-250)},但顾、黄的治学方法和具体疑伪观点会对阎氏产生影响应该说是毫无疑问的。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固可视为宋学结出的一

个硕果,清前期学术固可视为宋学余波,但其与元明之承宋学实已不同:元明之承宋学,就其学术前提而论,几为全部照搬,故卑弱两代,难为后世开山(大师如王阳明者,承陆九渊以臻大成,实乏开新,故后人将其合称为“陆王心学”。余者斗筭之器,更不足论)。而清前期虽仍多继承,然经明亡之痛,学者思其所自,率以归之宋明理学/心学之空疏谵妄。如顾炎武说“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原注:《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王何清谈之罪胜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为一世之患轻,历代之害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47](卷一八·朱子晚年定论条,1422)}王夫之更谓陆九渊出而宋亡,王阳明出而明亡。颜习斋于《与同乡钱晓城书》中又说:“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48](439)}宋人理学本继圣道之学(如宋季以来历代统治者都以程朱为继孔孟之道统者配享孔庙;同时,由一般士人甚至普通民众对程朱类于孔子、孔(老)夫子的称呼:程子、程(老)夫子、朱子、朱(老)夫子来看,他们也是承认程朱之继孔孟的),何以竟然“晦圣道误苍生”呢?原来是因为程朱陆王援佛老二氏入儒。如《宋元学案》载程颢“不废观释、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示佛语”^{[49](卷十六·伊川学案下,651)}。其弟程颐谓其“泛滥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50](638)}。朱熹亦自陈“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指佛学——邱按)”^{[30](卷一百四,2620)},又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30](卷一百四,2620)}，“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51]对于道家，宋明理学/心学亦多援用。理学鼻祖周敦颐《太极图·易说》中先于并高于“太极”的“无极”概念就是援引道家典籍《周易参同契》^[51]。再者，追溯理学与道家学术源流亦可见出两家联系：“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37](卷四百三十五·儒林五·朱震传，12908)}——所以，清前期学者痛诋宋明理学/心学之援佛道二氏入儒(王夫之至骂之为“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52](序论，10)})，并未冤枉宋明理学/心学。

据上述可知,清前期学者虽对宋学仍多继承,然却力辟佛老,群攻空妄。这样,继承中学术前提已渐趋改变。可以肯定地说,这正是清中后期弃虚蹈实、讲求经世致用学术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砰然关上了宋学之门,更悄然启开了顾、黄、王就开始手凿的清代学术之窗。

“清学”者，就史学言之，乾嘉之学也，今文经学也。故《四库提要》谓阎氏“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43〕〔291〕}。梁启超更谓阎氏著作明断“二千余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他”^{〔53〕〔69〕}的《古今尚书》“全部是假造”^{〔53〕〔69〕}以后，把“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的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53〕〔70〕}——如此，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怀疑的呢？清今文经学复兴，康有为疑尧舜、三代不过出自孔子托古改制之杜撰以至顾颉刚氏疑大禹是“虫”等等于此已见其必矣。这也正是本文将作为宋学余绪的元、明疑伪系于宋代一节叙述而将同为宋学余绪的清前期疑伪置于本节清今文经学的复兴予以叙述的深层原因。

乾嘉考据之学非本文所要考察的对象，但行文颇涉于彼，故略作剖析。世皆目乾嘉之学为对宋学的反动为汉学之远嗣，此语诚不谬，但我们也要看到乾嘉之学又实乃宋学之孑遗(除了政治原因，从学理上看，乾嘉之学肇于顾、黄、王，而如前述，诸家在力辟宋明理学/心学之空疏的同时又对其颇多继承，则此理极明；阎著的成就又起到了推动和典范的作用)。章学诚说：“今有人薄朱氏之学者^{〔1〕}，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朱子求一贯穿于多学而识，寓约礼而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九峰，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三传而为仁山、白云，四传而为潜溪、义乌，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1〕}换言之，宋学给乾嘉考据之学以目的论，汉学则予其以方法论——乾嘉之学实汉学、宋学通婚的遗腹子。路新生也说：“从清初逶迤而下至于乾嘉，汉宋兼采之风潜滋暗长，始终不歇。”^{〔40〕〔自序，10〕}惟其兼采汉宋，方能“超汉越宋。论者至欲特立‘清学’之名”^{〔41〕〔卷四百八十四·文苑一，13314〕}。

我们说，从学理的角度，乾嘉考据之学与清今文经学皆承宋学而来。然与考据学一样，康、雍、乾特别是乾隆时期的文网政策也是催生今文经学复兴的外部条件。复兴今文经学的第一人庄存与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方是时，国家累叶富厚，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审愚贱，才智不及主上万一”^{〔54〕〔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141〕}，更何况曾被乾隆斥为“不留心学问”而谕令其“闭户读书”^{〔55〕〔卷二十四·庄存与传，1796-1797〕}的庄存与呢？他惟有“自韬，污受不学之名”^{〔54〕〔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141〕}，但其内心“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56〕〔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238〕}。于是庄

存与选择了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以己意说经，长于发挥附会，“今文经学将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看法寄托于解经之中，用‘经’这张神圣的皮包裹起他们的真实意图，这种治学方法，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文人通经致用，以学资治的一种较为安全的特殊方法。”^{〔40〕〔100-101〕}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57〕〔267〕}，也正是这个意思。庄存与不仅选择通过今文经学来完成自己的曲折表达，而且私著述“密不示人”，“成书又不刊版行世”^{〔5〕}。但他终究心有不甘，而将“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的学术见解传授给子侄辈：庄述祖(侄)、庄绶甲(孙)、刘逢禄(外孙)、宋翔凤(外孙)(清著名史学家邵晋涵亦其门人)——常州学派矗矣。庄存与最主要的著作是《春秋正辞》，他一方面以己意说经，另一方面又说“指之必有所，持之必有其故，力争乎毫厘之差，深明乎疑似之介”，所以《清儒学案》说他“不斤斤分别汉宋”^{〔58〕〔卷七五·方耕学案〕}。——清学术汉宋兼采于兹又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庄存与是反对疑古辨伪的，以阎若璩“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54〕〔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141〕}这似乎与其后继者相矛盾——他的后继者都是疑古的。庄存与为什么反对疑古呢？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有益于教化，伪书和真书就具有一样的价值，所以庄存与在其《春秋要指》中进而提出了“《春秋》重义不重事”之论，又说“《春秋》非纪事之史也，所以约文而示义也”^{〔59〕〔卷三八七，823〕}。因此读《春秋》主要在于“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也就是说，只在于圣人所要表达的思想，而无论所载事迹之真伪，反过来说，《春秋》所载史事可以是假的，圣人托之喻意而已——正如庄子、韩非之寓言。这可以说和康有为以为儒家经典不过孔子托古改制之杜撰几无二致。所以，康有为不过把他的祖师爷的说法倒了个个儿并说得明确直白而已。这就看得出来，庄存与反对疑古与他的后继者疑古之间的矛盾只是表面现象，其内在精神，恰恰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是今文经学疑古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所以说，庄氏传人不仅没有违背师法，而且从实质上把握到并发展了师法。作为老师，庄存与深可慰矣。

庄存与之后，刘逢禄立足“《春秋》重义不重事”高张疑古旗帜，指《左传》为刘歆伪造，再次掀起今、古文经之争。我们今天依据考古资料知道《左传》非歆所造，刘逢禄是错了——但刘逢禄却将袭自庄存与的这一观点由反对疑古的立论基础改造成疑古的立论基础，成为常州学派的不二法门。换句话说，庄存与

的“《春秋》重义不重事”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是通过刘逢禄才得以实现的,所以,一般以为康有为是上继刘逢禄之衣钵的。总之,清今文经学自庄存与肇端,经刘逢禄开疆拓土已呈代考据之学而成学术主流之象了。

刘逢禄又以所学授龚自珍、魏源,彼二人声气相投,相扇而今文经学旗鼓更张。“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54](己亥杂诗,526)},龚自珍以诗人情怀而经而史,“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諛诡连犴……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60](54)},其疑古著作主要有《大誓答问》、《说中古文》诸篇,虽囿于门户之见多有不通处,但其幼承段玉裁治小学,音韵、训诂、版本、目录诸学造诣颇深,所以虽疑古,然尚重证据,与后康有为纯从政治目的出发主观武断相比,自可见出乾嘉遗风的影响。

与龚氏同时而稍后的魏源由于经历了鸦片战争,倡言经世致用,主张“以经术为治术”。他主张的“经术”自然是今文经学。为了“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于是著《书古微》、《诗古微》等。在《书古微》中,魏源提出不仅要“正伪”,还要“补亡”——则其所补,与梅賾之伪作何异?!李慈铭谓其“才粗而气浮”,“于经学实无所解,乃大言自矜……猖狂无忌,开口便错”^{[61](869)},“文字之疏,引据之失,不及屡指。”^{[61](875)}章太炎更讥其“夸诞好言经世……乃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62](清儒,158)}但魏源使学术近就政治——虽然牺牲了学术——的作法正为康有为之直接先导。所起作用与廖平经学体系之于康有为是一样的——廖平的经学体系正是孔子改制的滥觞。换言之,魏源给康有为以方向,廖平给康有为以道具。所以世皆谓康有为袭用廖平陈说,而我以为康有为即使不受廖平影响,也会沿魏源指给他的方向找到这个道具。并且不止魏源,把康氏提出的“《春秋》在义不在事”^{[63](卷一·春秋旨第一,1)}与庄存与“《春秋》重义不重事”相比较,我们更可看出其之所以为必然的内在理路。即是说,廖平的道具,也正是从庄存与以来的清今文经学推绎而出的。以《尚书》为例,有了庄存与的“《春秋》重义不重事”,西汉以来的“孔子序《书》说”才会变成廖平的“《春秋》因鲁史加笔削,《诗》与《书》、《礼》、《乐》亦本帝典而加笔削,合者留,不合者去,则《诗》、《书》乃孔子之《诗》、《书》矣”^{[64](186)},才会进一步变成康有为的“《书》……孔子作,伏生所传本是也”^{[57](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245)},即“孔子作书说”。廖平本可直接提出“孔子作书说”的,但其无康氏之胆略——

廖平一介经师而已,自乏康氏改革家之政治眼光,所以他只是掀开了帷幕的一角,而终由康有为拉开整个帷幕。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他给康有为启示固可,但无宁说他更给康氏以信心——他使康有为看到,自己所要拉开的帷幕已经有人在拉动了而更增加了拉开帷幕的勇气与力量,连续写出了《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两部疑古名著。

《新学伪经考》指全部古文经书皆刘歆伪造,所以,“二千年之学,皆新学,皆伪学”。刘歆作伪的目的当然是取媚于新莽。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的确是很有胆略的,甚至于出土文物与其主张的今文经学相矛盾时,他也敢断言“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60](56)}。这样大胆的“学术研究”只会取得极小的“学术价值”,不过,清今文经学家自魏源起已经并不是在追求学术价值,他们追求的是学术——如果他们的研究还可以称作学术的话——的政治价值。这一点,他们是做到了且极富成效,故而梁启超在总结《新学伪经考》的影响时乃自信地说:“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计。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60](56)}

既然古文经学皆刘歆伪造,是伪学,所以要探求真,了解孔子真正的微言大义,便只有学习今文经学并且只能学习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在他看来,他的今文经学前辈庄、刘、龚、魏仍受到“事”之羁绊,对“义”的重视还是不够的。所以他才把庄存与的“《春秋》重义不重事”改为“《春秋》在义不在事”。那么,在康氏看来,孔子真正的微言大义是什么呢?从其所谓“孔子之为万世师,在于制作六经,其改制之意,著于《春秋》。孔子早而从周,晚暮道不行,思告后王,于是改制”^{[65](19)}——可见,在康氏心中,孔子的微言大义不过“改制”两字而已——于是又作《孔子改制考》以发明之。

康氏两考,要非学术,不过是穿着学术外衣的政治主张与口号。他说孔子托古改制,其实是他自己要托古改制。他说刘歆伪造古文经学,其实他自己正在模仿刘歆。总之,康有为不过“借孔子之魂,扬新教之幡”^{[40](486)},借刘歆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而已。康有为在把清今文经学的影响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同时也终结了其作为一种学术的存在。钱穆说:“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真是一派胡言。既非经学,亦非史学……乾嘉以来之考据学至此也复之扫地以尽。”^{[66](273)}

康有为既要借孔子托古改制为己张目,其主观目的自要尊孔,但其以孔子托古改制而作《春秋》等六

经，却显出孔子是一个为申一己之说而伪造历史的造伪专家，客观上反倒动摇了孔子的神圣地位——所以王先谦、叶德辉等均痛诋康有为无父无君，甚至要求朝廷处死他——这对近代五四新文化以否定孔子为中心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疑古史观的建立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龚、魏、康有为对清今文经学的发展，除了前述学理运动的必然之外，他们所处的时代条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这方面的分析早已汗牛充栋，故不赘言。在此尚须一提的是崔述，崔述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正好经历了清王朝的由盛转衰。他最主要的著作是《考信录》，所疑范围不惟经文传注，凡事必疑，凡事必考，考而后信。在他那里，几乎没有什么是不经过考证就可以相信的，对近代疑古史观的建立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崔述总结辨伪经验的话“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67](释例·世益晚则采择益杂条，13)与顾颉刚疑古史观“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68](60)观点相对照，此点不难见出。但崔述在清代的影响却并不大，这一方面因为他的著述的晚出，更多的却是他的学术研究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①。我们已经知道，清前期学术降而分为乾嘉考据学和清今文经学，其末精要尽失。所以与崔述同时代的章学诚对之大张挞伐，讥考据学家“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桑叶而不能抽丝”^[69](卷九·与汪龙庄书)；讲理学家“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69](卷九·家书五)，而崔述的研究恰恰直承清前期学术，杂糅汉宋，融汇乾嘉学派与常州学派之长而得以规避章学诚所讥诮的二派之短，如果章氏能够见到崔氏的著作，恐怕他就不会以为其时学风皆如所陈了。可以说崔述学术基本上直承“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他们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精神是‘超汉学’、‘超宋学’的，能令学者对于二百多年的汉宋门户得一种解放，大胆地独求其是”^[53](28-29)，故而“崔述是非今(文)非古(文)、非汉非宋、非朱非王的；他是兼采众家，不拘门派的。”^[40](241)正以此故，有人将崔述视为乾嘉考据学者，如刘师培说：“述生乾嘉间，未与江、戴、程、凌相接，而著书义例则殊途同归”^[70](卷十八·崔述传，1825)；也有人将他视为理学家，如胡适说崔述不仅是宋学，而且是“宋学中的朱学”^[71](146)；但又有人认为他并不是考据学者，如与他同时代的考据学者就极力苛诋崔述，崔述自己也不这样认为，如他质问考据学者“独于古帝王圣贤之行事之关于世道人心者，乃反相与听之而不

别其真贋，此何故哉？！”分明是反对考据学的；严守家法的今文经学家当然也不会引其为同类。这样他的学术因为得不到当时主流学派的认可，自然不可能产生多大影响，甚至后来第一个接受他学术思想的也不是中国人而是长康有为近十岁的日本史学家那珂通世。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亦数次称引《考信录》，康氏疑古而采取考据形式恐怕不能说完全未受到崔述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刘逢禄经龚魏廖平迄康有为的整个清今文学派将其祖师爷庄存与的反对疑古改造成疑古(如前述)恐亦非完全未受到崔述的影响，换句话说，疑古的清今文经学可能有两位祖师爷：除了庄存与外还有崔述^②——但崔述学术真正产生影响却要到上个世纪初期他被顾颉刚“发现”之后。

注释：

- ① 近现代史的分期迄今仍是一个尚未取得一致认识的问题，自胡绳著文首申，学者多倾向于将近代史的下限划到1949年。本文对“近代”一词的使用即依其论。
- ②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我承认我的工作清代学者把今古文问题讨论了百余年后所应有的工作”，并进一步坦承：“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虽为夫子自道，实可视为研究近代疑古思潮与清今文经学桃嗣关系的第一篇论文，详见参考文献[1]。其后，胡适、王汎森等皆言及于此，具体参见参考文献[2]、[3]。
- ③ 王奇生谓“民主”与“科学”理念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即广泛传播，并已颇入人心，并非始倡于《新青年》而大行于世。持论严谨，论证精密，本文所取“民主”、“科学”概念始播我国的时间界定即以之为据。具体参见参考文献[11]。
- ④ 其间刘知几对之颇有非议，在《史通》《疑古》、《惑经》篇中以为其所载尧、舜禅让是虚语，桀、纣之恶是厚诬；韩愈弟子李汉也说过一句“《书》、《礼》剔其伪”的话，正如后面将要引述到的孟子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及其它先秦类似引例)一样，实非疑《尚书》为伪，更非疑《孔传尚书》之伪，其意犹我们今天说“使用文献资料要考辨”或云“要带着批评眼光读书”——虽以其记录可能失真，但并非以其书为伪以其作者有意作伪。
- ⑤ 如蔡沈《书集传》、梅鷟《尚书考异》等。
- ⑥ 赵汝谈撰《南唐书说》三卷(《直斋书录解題》作三卷，《宋志》作二卷)，今佚；洪迈之论见其著《容斋题跋》；晁公武之论见其著《郡斋读书志》；陈振孙论见其著《直斋书录解題》，另有《书说》二册，今佚；蔡傅撰《书考辨》，今《西京清麓丛书》续编中；王柏撰《书疑》九卷；王应麟论见其《困学纪闻》；金履祥撰《书经注》、《尚书表注》。蔡沈、赵汝谈皆朱熹弟子，王柏为朱熹三传弟子，金履祥为王柏三传弟子，王应麟学术亦出朱熹——此可见出朱熹影响。
- ⑦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三经新义》遭到保守派的围剿，除《周官新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十六卷，今均佚。
- ⑧ 虽佚，然《松雪斋集》、朱彝尊《经义考》均录其《自序》，可略窥涯涘。

- ⑨ 《四库》谓原稿未分卷数特约略依其篇页厘为五卷。
- ⑩ 罗敦仁有《尚书是正》二十卷，郝敬有《尚书辨解》十卷，郑瑗有《井观琐言》三卷，杨守陈有《书私抄》一卷，归有光有《尚书叙录》(卷不详)，焦竑有《焦氏笔乘·续集》三卷，胡应麟有《四部正讹》三卷，吴炯有《书经质疑》一卷，郑晓有《尚书考》二卷，均涉笔于此。
- ⑪ 《经义考》著录作二卷，《清代著述表》则题作《授书笔录》一卷，但注明一题《书经笔授》，此据《清史稿·艺文志》。
- ⑫ 朱熹：《答汪尚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页。其文后虽言“然未能有所得”，实自白之词，未可信之。
- ⑬ 此指戴震。见章学诚：《书朱陆篇后》，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74-277页。章在《又与朱少白书》中亦说明了此点，谓“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朱子之教……至国初而顾亭林、黄梨洲、阎百诗皆俎豆相承，甚于汉之经师谱系。戴氏亦从此数公入手，而痛斥朱学，此饮水而亡其源也。”见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 ⑭ 《内篇·朱陆》，《文史通义校注》第264页。邱按：勉斋为黄干，九峰为蔡沈，西山为真德秀，鹤山为魏了翁，东发为黄震，厚斋为王应麟，仁山为金履祥，白云为许谦，潜溪为宋濂，义乌为王祜，宁人为顾炎武，百诗为阎若璩。
- ⑮ 见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载庄存与《味经斋遗书》卷首，阮氏《研经室集》未收。
- ⑯ 顾颉刚认为这是因为崔述“不与外方通声气”的缘故。详见《崔东壁遗书序》，《崔东壁遗书》第58页。
- ⑰ 此点尚待进一步详证。

参考文献：

- [1] 顾颉刚. 自序[C]//顾颉刚. 古史辨：第一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103.
- [2] 胡适. 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C]//顾颉刚. 古史辨：第二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31-342.
- [3] 王汎森.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M].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
- [4] 刘俐娜. 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 [5] 田旭东. 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6] 刘俐娜. 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7] 曹家齐. 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M]. 北京：西苑出版社，1999.
- [8] 张越. 论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转型[J].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2002)：152-166.
- [9] 杨国荣. 史学的科学化：从顾颉刚到傅斯年[J]. 史林，1998(3)：91-101.
- [10] 朱发建.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1902~1949)[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11] 王奇生.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J]. 中国近代史研究，2007(1)：21-40.
- [12]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13] 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G]//阮元. 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4] 墨翟. 墨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5] 王念孙. 读书杂志[M]. 北京：中国书店，1985.
- [16] 刘起釭. 尚书学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8]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9] 王鸣盛. 蛾术编[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 [20] 蒋善国. 尚书综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21] 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22] 段玉裁. 古文尚书撰异[G]//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第46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23] 王充. 论衡[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24] 陆德明. 经典释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5] 孔颖达. 尚书正义[G]//阮元. 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6] 魏征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27] 刘煦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8] 皮锡瑞. 经学历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9] 焦循. 尚书补疏[G]//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第4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30]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1] 孔丘. 论语[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 [32] 孟轲. 孟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33] 刘歆. 移书让太常博士[G]//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34]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5]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 [36] 韩愈. 古诗五：卷五[C]//韩昌黎全集. 北京：中国书店，1991.
- [37]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38] 王应麟. 困学纪闻[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39] 陈师道. 后山谈从(及其它一种)[G]//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0] 路新生. 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41] 赵尔巽等.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42] 阎若璩. 尚书古文疏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43]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一[M]. 台北：艺文印书馆，1969(中华民国五十八年).
- [44] 周予同. 历史文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45] 谢国桢.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46]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47]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48] 颜元. 颜元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49] 黄宗羲. 全祖望. 宋元学案[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0] 程颐. 明道先生行状[C]//程颐, 程颐. 二程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51] 侯外庐, 邱汉生, 等. 宋明理学史(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52] 王夫之. 張子正蒙注[C]//船山全书: 十二. 长沙: 岳麓书社, 1992.
- [53]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专集七十五[C]//饮冰室合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54] 龚自珍. 龚自珍全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 [55] 王宗翰. 清史列传(第六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56] 魏源. 魏源集(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57] 康有为. 孔子改制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58] 徐世昌. 清儒学案[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 [59] 阮元. 清经解(第二册)[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8.
- [60]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专集三十四[C]//饮冰室合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61] 李慈铭. 越缦堂读书记(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62] 章太炎. 诂书[C]//章太炎全集: 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63] 康有为. 春秋董氏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64] 廖平. 知圣篇[C]//廖平选集: 上. 成都: 巴蜀书社, 1998.
- [65] 康有为. 长兴学记[C]//康有为. 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66] 钱穆. 中国史学名著[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 [67] 崔述. 考信录提要: 卷上[C]//崔东壁遗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68] 顾颉刚.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C]//顾颉刚. 古史辨: 第一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59-66.
- [69] 章学诚. 章氏遗书[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 [70] 刘师培. 左龠外集[C]//刘申叔遗书.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71] 胡适. 科学的古史家崔述(1740—1861)[C]//胡适文集: 第七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Distinguishing the truthfulness of *Shangshu* and the New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Qing Dynasty

——Distinguishing the Truthfulness of *Shangshu*, the New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Qing Dynasty and Recent Study on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Suspecting the Past(1)

QIU Zhicheng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idea of suspecting the ancient began a long time ago. Until after Song dynasty many scholars in Confucian classics suspected the truthfulness of the *Shangshu*. Yan Ruoku in Qing dynasty made sure of its falsity in his book entitled *Explanation and Evidence of Shangshu*, which gave rise to the new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Qing dynasty. Moreover, this new study suspected not only the truthfulnes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but also the truthfulness of historical facts. In late Qing dynasty Kang Youwei claimed that the history of Yao, Shun and the three dynasties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y) were unbelievable. And in recent age, Hu Shi and Gu Jigang continued this kind of new study by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experimentalism and proposed that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had been crea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ccording to this idea, all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was false (In May the fourth New Cultural Movement this ideological trend of suspecting the ancient and the idea of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teracted, further resulting in total neg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ased on the study above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recent converg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deas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y has begun its modern transformation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distinguishing the truthfulness of *Shangshu*. This article is just the first part of study and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inguishing the truthfulness of *Shangshu* and the new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distinguishing the truthfulness of *Shangshu*; modern script of Confucian classics;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of Confucian classics; ideological trend of suspecting the ancient;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y; scientizing history

[编辑: 颜关明]